

上古漢語“也”“毆”“旃”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補論*

宮島 和也

成蹊大学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Old Chinese particles “也 yě,” “毆 yì,” and “旃 shā”

MIYAJIMA Kazuya

Seikei University

Summary

In Old Chinese, “也 yě” is a frequent particle and normally appears in sentences as a predicate marker or after phrases and clauses as a topic marker. Particles “毆 yì” and “旃 shā” are dialect variations of “也 yě.” “毆 yì” is used in 秦 Qin. Ohnishi (1998) researched excavated documents from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revealed that in the unification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by 秦 Qin, “毆 yì” and “也 yě” had a complex process of replacement. 秦 Qin forced conquered regions to use “毆 yì” and stop using “也 yě” first, but later “也 yě” became an official word before the era of 二世皇帝 (秦二世 Qin Er Shi). “旃 shā” appears in excavated document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三晉 San Jin (or 中原 Zhong Yuan). It might have been originally used in this area; “也 ye” is used in 楚 Chu, 齊 Qi, and 燕 Yan. “旃 shā” also appears in excavated documents of 吳 Wu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 consider that 吳 Wu borrowed the particle from 晉 Jin in spite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cause 晉 Jin and 吳 Wu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to compete against 楚 Chu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也 ye” was assumed to replace “旃 shā” in the countries of 三晉 San Jin, that is, another particle replacement in eastern regions before the replacement of “毆 yì” and “也 yě” by 秦 Qin.

Particles “也 yě,” “旃 shā,” and “毆 yì” represent regional diversity and interaction among regions in Old Chinese, including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 and its complex motivation.

Key words: Old Chines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Excavated documents, Particle, “也 yě/毆 yì/旃 shā”

關鍵詞：上古漢語 地理分佈 出土文獻 助詞 “也/毆/旃”

*本文在“出土文獻與漢字發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2023年9月9日）上宣讀過；寫作過程中得到羅盛吉先生、戶內俊介教授、野原將揮教授、海老根量介教授、李守奎教授、馬曉穩教授的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1. 前言

本文討論上古漢語助詞“也”“毆”“旃”，尤其是東周時代東方地區的“也”和“旃”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這三個詞都具有相同的功能，應當是方言變體。大西克也（1998）論證“毆”本來屬於秦方言，“也”則是東方地區的方言詞，而秦國一統天下後“毆”成為標準書面語用詞，但後來“也”逐漸滲入標準書面語裡面，最後“也”成為一個通行的、標準的詞，代替“毆”。本文基本贊同這個看法，但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加，發現這個交替現象之前也發生過比較複雜的現象，即在東方地區“也”和“旃”的傳播和交替。本文主要討論出土文獻中的“也”和“旃”，以試圖更精確地表明當時各地書面語的地域性差異和互相交流。

2. “也”和“毆”

2.1 “也”的用法

“也”是在上古漢語當中很常見的助詞，東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出現於書面語上。其用法複雜多樣，關於如何統一定性其具體的語義功能，歷來有爭論而似未有定論。據宮本徹、松江崇（2019: 96-98），“也”的主要用法有兩種，一是用於句末，加上判斷、確認的意味，如¹：

- (1) 女，器也。《《論語·公治長》》
- (2) 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下》》

另一類則是用於句中的詞或從句之後，把它當作主題，如：

- (3)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論語·公治長》》
- (4)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2 “也”和“毆”的關係

“毆”的用法、功能與“也”相同，如：

- (5) 丙，乙妾毆。《睡虎地秦簡《封診式》42號簡》

¹ 下例（1）-（4）引自宮本徹、松江崇（2019: 96-98）。

- (6) 司寇勿以為僕、養、守官府及除有為𣪠。(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50號簡)
- (7) 其大厩、中大厩、宮厩馬牛𣪠，以其筋革角及其賈錢效。(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7-18號簡)
- (8) 有事請𣪠，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188號簡)

“也”和“𣪠”語音不同，“也”是以母歌部(*laiʔ)²，“𣪠”是影母脂（或祭）部(*ʔih)，兩者並不是普通的通假或假借關係，當是方言變體³。具體來講，“𣪠”應當本來是秦國方言的詞，“也”則是通行於東方地區的形式⁴。歷史上，特別是從秦代到漢初發生過“𣪠”和“也”的交替，大西克也（1998, 2001）調查秦漢時代的出土文獻來描寫、分析其交替過程，將其總結為如下：

在秦統一各國的過程中，“𣪠”滲透到了舊六國的地域。秦當時在行政上使用隸書，並強制在公文書類上使用“𣪠”字。此時，在書面語水平上，“𣪠”的方言性已大為淡化。即使在〔睡虎地秦簡的：引用者〕《為吏之道》和〔馬王堆帛書的：引用者〕《五十二病方》等出於舊六國的文獻中，也出現了使用“𣪠”的抄本。所以，把舊六國統一後出現的使用“𣪠”的抄本，說成是秦方言書寫的觀點是欠妥的。然而，在秦朝，至遲到了二世皇帝元年的時期，將“𣪠”改定為以“也”來表記。這樣，來自舊六國地域的“也”字取得了標準語的地位。這項改革在漢代得到了繼承。可見，這種“𣪠”“也”的交替，祇不過是秦採用的語氣助詞表記法的改變，各地在口頭語言上仍然可能使用各自的方言。也就是說，“𣪠”“也”的交替是不具有口語變化背景的人為的變化⁵。

本文贊同這個看法。但關於東周時代“也”和其變體的關係似乎更為複雜，具體來講在東方地區除了“也”以外還存在過“旃”，“旃”和“也”之間的關係也是值得關注的。其實大西先生也指出過語氣助詞“旃”的存在⁶，然而沒有進行過具體的討論。後來隨著相關材料的增加，對於“旃”的字形、用法等有了新的認識，

² 擬音根據 Schuessler (2009)，下同。

³ 參見大西克也（1998: 4）。大西克也（1998: 4）也指出“也”的歸部也有魚部或佳（支）部說。

⁴ 參見陳昭容（1993: 599）以及大西克也（1998: 4, 2001: 614）等。

⁵ 大西克也（2001: 625）。

⁶ 大西克也（2001: 625注4）云：“《中山王響鼎》、《中山王響壺》中‘旃’[即‘旃’：引用者]用法與‘也’相同，但釋字中有問題”。

本文在下文先總結先行研究對“旃”字的分析以後，補充討論東周時代語氣助詞“旃”“也”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以表明東周時代書面語的多樣性和各地之間的交流。

3. “旃”

3.1 “旃”的用法和釋讀

正如朱德熙（1979/1995: 92）、大西克也（1998: 20注4, 2001: 625注4）等所說，“旃”用法與“也”相同，如：

(9) 則上逆於天，下不順於人旃。（中山王譽方壺，《集成》09735）

(10) 謀慮皆從，克有功，智旃。（中山王譽鼎，《集成》02840）

(11) 寡人聞之，與其溺於人旃，寧溺於淵。（中山王譽鼎）

尤其是（11），與此相似的句子亦見於傳世文獻《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中（下例12），其中作“也”⁷，可見“也”和“旃”相對應：

(12)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上舉諸例“旃”字形作“𣎵”⁸，過去大多學者將此字釋為“旃”，讀為“也”⁹。然而這個看法將作“𣎵”字的“𣎵”看成是“它”的變形，字形解釋較勉強，並且“它”與“也”在語音上也有距離¹⁰。後來吳振武（2006）指出此字的“𣎵”源自彤沙（繫在戈上的紅色纓子）之“沙”的象形初文，“𣎵”是從“𣎵”、“沙”聲的一個字，目前此看法可謂已得到很多學者的認同¹¹。本文也認為這個看法很合理，然而吳振武（2006）說“沙”和“也”語音接近，“旃”可讀為“也”，就此則仍有討論的餘地。因為“沙”是生母歌部（*srâi），如上述“也”是以母歌部（*laiʔ），“也”和“旃”的語音，特別是聲母有所不同，似乎不能看做是一般的

⁷ 參見Takashima（1997: 184-185）。

⁸ 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7: 5143）。

⁹ 如朱德熙（1979/1995: 92）、張玉金（2011: 531）等。另外也有釋為“旃”“旃”的看法，都不太可信（參見吳振武2006: 74）。

¹⁰ 參見吳振武（2006: 74）。實際上，上引朱德熙（1979/1995）後來1995年版所加的“編按”云：“後來我們感到釋此字為‘旃’根據不足，而且‘它’‘也’古音有異，‘旃’恐怕不能讀為‘也’，放棄釋為‘旃’的看法。張玉金（2011: 531）認為‘旃’從‘也’聲而‘旃’可讀為‘也’，恐怕不妥當。”

¹¹ 參見李守奎（2014/2015: 208）。

通假關係。就此本文認為應該至少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正如“毆”和“也”，“旃”與“也”也是方言變體的關係¹²；另外是語氣詞語音形式不一定是穩定的，因此其記錄形式或許有幾個變體，也就是說雖然“旃”與“也”的讀音不同，也許“也”和“旃”這兩者記錄著同一個詞。本文目前認為前者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不能完全否認後一說，在此暫時提出這兩種看法。

3.2 “旃”的地域性

“旃”還見於春秋後期晉國的侯馬盟書¹³（13）以及溫縣盟書¹⁴（14）（“馬”“檮”當是人名）；上例（9）（10）（11）是中山王墓出土的銅器銘文上的例子¹⁵，中山國的文字一般歸入三晉文字中；如（15），戰國楚簡的清華簡《筮法》中既出現與楚文字寫法相同的“也”，也見“旃”，而據李守奎（2014/2015b）清華簡《筮法》中可見帶有三晉文字特徵的字，文本與三晉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清華簡《筮法》中的“旃”可視為受到三晉地區底本的影響或其殘留：

（13） 馬旃至于…（一八五：九）¹⁶

（14） 搜旃…（T1K1—3589）¹⁷

（15） 三吉同凶，惡爻處之，今旃死。（清華簡《筮法》11號簡）

由此可見，“旃”與三晉（中原）地區密切相關，應當具有地域性特徵。

4. “也”和“旃”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

4.1 “也”和“旃”的地理分佈

東周時代的楚、齊和燕的資料中可見“也”¹⁸。特別是楚、齊，早在春秋時代

¹² Takashima (1997: 185注14) 也提出過“旃”為東北地區方言的特徵或者“旃”和“也”在形態上有關聯這兩種可能性，但Takashima氏將“旃”釋為“旃”(zhan)，且認為“旃”表示“旃”(yi)而讀為“也”，釋字上仍有問題。

¹³ 侯馬盟書出土於山西省侯馬市，其年代有所爭論，根據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1976：1）、江村治樹（2000：658–661）等，與春秋時代晉國趙氏的內訌及其後的盟誓（《左傳》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記載“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有關，暫從此說。

¹⁴ 溫縣盟書出土於河南省溫縣，其年代被視為晉定公十五年，即前497年（參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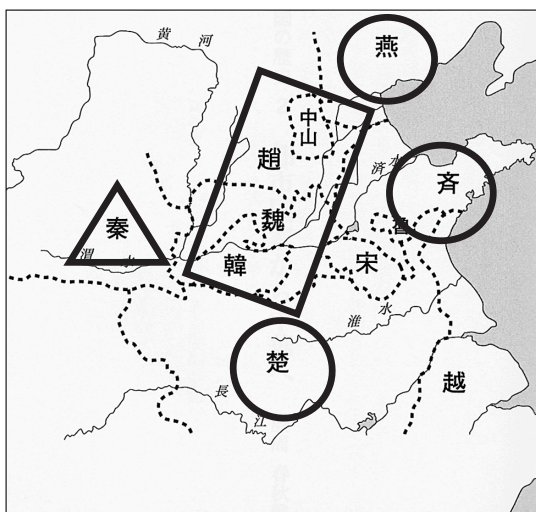
¹⁵ 中山王墓位於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譽方壺、中山王譽鼎等所出土的一號墓的年代被視為前310年左右（參見河北省文物管理處1979）。

¹⁶ 釋文引自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1976：48）。

¹⁷ 參見蘇建洲（2016：138）。

¹⁸ 參見陳昭容（1993：599）以及大西克也（1998：20注4）（2001：625：注4）。

的資料中已經出現“也”，如楚國的“競孫鬲”（春秋晚期後段¹⁹）、齊國的“庚壺”（春秋晚期²⁰），戰國時代楚地出土的簡帛資料（除上舉清華簡《筮法》中的“旃”）中也只見“也”。可見這些地區很早就開始使用“也”。另外，戰國時代燕國的資料（“王后右酉（曹）方壺”²¹）中也可見“也”。如上述，秦國用“毆”；“旃”應當具有三晉（中原）地區的特徵，並且“旃”見於春秋後期的溫縣盟書中，頗有可能晉國當時已經用“旃”。因資料有限，雖只是很粗略的描寫，但由此可見，其地理分佈以戰國時代為例大體可以歸納為如下²²（“○”“□”“△”各自代表“也”、“旃”以及“毆”）：



也就是說，就東周時代的語氣詞而言，除了“毆”和“也”以外，在東方地區中似乎存在過“旃”和“也”的對立，不僅是秦國與其他東方地區用不同語氣詞，似乎在東方地區的國家之間也存在過差異。

從上圖可以看見北方的燕國和南方的楚國用“也”，中間的中原地區用“旃”，似乎呈現出所謂“ABA”分佈，意味著“也”是較古老的形式，“旃”則是創新。然而戰國時代之前未見燕國資料中的“也”，此說能否成立存疑。

4.2 “旃”和“也”的演變

關於春秋時代以後的“旃”和“也”的分佈情況大體上可以如上圖描寫，但仔細查檢相關材料後發現，東周時代東方地區“旃”和“也”的使用上似乎也有變化，下文試圖進行討論。

¹⁹ 參見黃錦前（2017: 135）。

²⁰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07: 5368）。

²¹ 參見黃盛璋（1984: 61–62）。

²² 地圖引自平勢隆郎（2020）。

4.2.1 吳國的“旃”

除了與三晉（中原）地區有關的資料以外，“旃”還見於春秋時代吳國的資料中²³：

（16）攻（句）虞（吳）王姑讎烏雖曰：“余壽夢之子，余毇毇（句）鄫（餘）之敵弟。毇毇（句）此鄫（餘）命初伐麻，敗麻，獲眾多。命禦荊，荊奔。王圍旃旃既北既殃，不我敢當。”²⁴

（17）攻（句）毇（吳）王光旃旃以吉金自作用劍。²⁵

（16）中的“攻（句）虞（吳）王姑讎烏雖”即吳王餘昧²⁶。據曹錦炎（2015: 147）以及魏宜輝（2018: 86–87）“王圍”即楚靈王，“命禦荊，荊奔。王圍旃旃既北既殃，不我敢當”這一句可以理解為“毇句餘（吳王餘祭）命令餘昧抵禦楚國的進攻，楚國被打敗逃跑。楚靈王他兵敗、有災禍，不敢抵禦我們（吳國）”²⁷。（17）的“攻毇王光”則是吳王闔廬²⁸。這種後置於人名的“也/旃”，也可以認為是語氣詞²⁹。

吳國位於長江下游，建都於姑蘇（現在的蘇州），地理上與楚國很接近，反而與三晉（中原地區）相隔得比較遠。按理說吳國更有可能受到楚國的影響而用“也”，（16）（17）中却用“旃”。

就此器中的“旃”，李守奎（2014/2015: 218）云“吳〔振武：引用者〕老師指出三晉系文字與吳文字地域遠隔，如何發生關係需要考慮。…〔中略〕…許多不見於後世的古文字在多系文字中出現，可能是有共同的來源，也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結果。這也是未來可以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後來蘇建洲（2016: 139）則指出：“吳王光劍〔即本文例（17）：引用者〕‘也’作‘旃’形恐怕也不能排除受到三晉文字的影響。”

本文認為，（16）（17）中使用“旃”（或者說吳國使用“旃”）這就是受到晉國書面語的影響³⁰，且與當時歷史背景有關。大約從前7世紀末晉國與楚國激烈對立，晉國為了抑制楚國，與吳國聯合，《左傳》成公七年（前584年）記載晉國派遣

²³ 參見李守奎（2014/2015: 211–214）、蘇建洲（2016: 138–139）。

²⁴ 釋文參見程義、張軍政（2015）、魏宜輝（2018: 82）。

²⁵ 釋文參見李守奎（2014/2015: 211），但釋讀有所調整。

²⁶ 參見程義、張軍政（2015: 77）、魏宜輝（2018: 82）。據《史記》，餘昧的在位期間為前530–前527年（而根據《左傳》的記載，其在位期間則為前543–前527年）。

²⁷ 參見曹錦炎（2015: 147–148）、魏宜輝（2018: 82–83、87）。

²⁸ 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闔廬的在位期間為前514–前496年。

²⁹ 參見李守奎（2014/2015: 216）。但如魏宜輝（2018: 86），也有研究認為這種“也”是一種詞綴。

³⁰ 這當然也不是直接意味著晉國與吳國的口頭語言很接近。

巫臣“通吳于晉”而讓吳國背叛楚國³¹，從此吳國與楚國則一直處於敵對狀態³²。當時應當就是吳國開始使用漢字的時候，根據陳昭容（2016: 159–161），吳到春秋中期（前6世紀初）才開始出現於史書中³³，並且目前最早有銘文的吳國青銅器“者減鐘”也是幾乎相同時期的（前600年左右），“〈者減鐘〉的器形紋飾與中原相同，銘文的格式也與中原器物的格式一致，… [中略] … 〈者減鐘〉的銘文內容，與其他國家製造的鐘銘相差不多”³⁴，可見至遲當時已經接受漢字文化。也就是說，吳國接受漢字的時候與晉國關係密切且良好，與楚國則互相對立，頗有可能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吳國接受中原的“旃”而未接受楚國等的“也”³⁵。

4.2.2 三晉的“旃”和“也”之交替

除了上舉資料之外，其實“也”在戰國時代三晉地區有關的出土文獻中也可見：

（18）卅三年單父上官乳＝（孺子）憲所受坪（平）安君者也。（平安君鼎，《集成》02793）³⁶

相同文例也見於“卅二年平安君鼎”（《集成》2764）。根據有虞同（2009），這些“平安鼎”的年代為戰國晚期。就其國別則有爭論，吳良寶（2009）認為衛、魏的可能性都存在³⁷。就此本文不能做出判斷，但可以說頗有可能是三晉或與此密切相關的國家之器，而在其器中卻用“也”³⁸。另外，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

³¹ “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寔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³² 參見曹錦炎（2015: 145）。

³³ 《春秋經》成公七年（前584年）“吳伐郟”、“吳入州來”是其最早的記載（參見陳昭容2016: 159）。

³⁴ 陳昭容（2016: 159–160）。

³⁵ 馬曉穩（2017: 777）對比吳越文字和其他地區的文字後指出，“吳越文字，尤其是吳國文字整體面貌與楚文字大同而小異，過去將其歸入楚系還是很有道理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發現，吳文字的一些字形與楚文字有些不同，甚至個別字形受到了晉系文字的影響”，並且引用本文注31所引的《左傳》成公七年的記載，云“壽夢之前吳國為楚之附庸，所以文字的整體面貌與楚系文字相似。申公巫臣通吳後，吳國密切了與晉國的關係，所以有些字形合於晉系，而不類於楚。目前見到的吳國文字資料時間都在壽夢之後，所以也可以說，《左傳》這段記述正是吳國文字特征來源的歷史闡釋”，與本文看法相似。吳國文字與楚、晉文字之間的關係，似有待進一步探討。

另外，2014年在山西省西南部出土的四件戈上記載吳王的同母弟與晉國的“趙氏餘”共同鑄造了三百件戈，這也說明晉與吳的密切關係（參見佐藤信彌2021: 146–147，陳光軍2016則認為是晉地鑄造的吳國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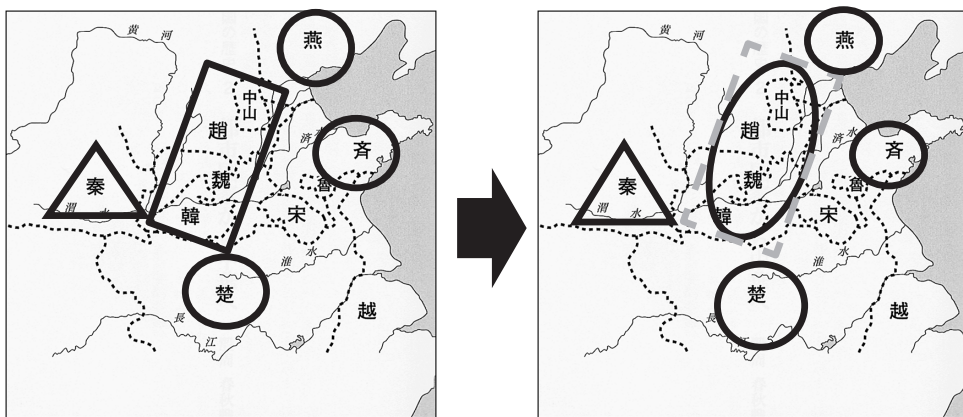
³⁶ 釋文參見郭永秉（2018: 111）。

³⁷ 就此也參見郭永秉（2020: 111–114）。

³⁸ 李守奎（2014/2015: 208）引用上舉平安鼎中的“也”而云“從相關晉系文字資料來看，晉文字‘旃’‘也’並用”。

書》雖然是西漢早期的文獻，但較多保留戰國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³⁹，其中未出現“旃”，只見“也”。

本文認為，這些戰國時代三晉（中原）有關的出土文獻中所見的“也”，有可能代表在當地發生過“也”替代“旃”的演變，即如下圖所示，至遲到春秋後期中原地區開始用“旃”，而到了戰國晚期則已不常用“旃”。值得關注的是，平安君鼎銘文是實用性的，中山王器銘文則內容莊重，文字也修飾性很強，因此中山王器銘文中的“旃”或許可以視為存古現象⁴⁰；清華簡《筮法》中“也”和“旃”混用，有可能不僅是其底本的三晉因素之殘留，也體現出三晉地區“旃”到“也”的演變在進行的面貌。



東方地區的書面語共性較大，大西克也（2006: 156–159）指出，語法詞彙及其用字習慣在秦以外的東方地區之間一致性很高，比如秦國時間副詞用“且”、其他東方地區則用“旃”（將），這應當是（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互相影響的結果。同樣，頻繁的來往和互相交流之中，書寫較方便的“也”在三晉也被開始使用且代替“旃”，也是很有可能的。其實與“毆”和“也”相比，“旃”和“也”讀音相對接近（這也似表示著東方地區語言的共性較高，與秦國則有一定的距離），將“旃”替換為“也”的門檻也比較低。也就是說，秦國以“毆”替代“也”之前，有可能在東方地區書面語中發生過被“也”的“統一”⁴¹。如果“也”和“旃”為兩個方言變體，如在本文2.2中引用的大西克也（1998, 2001）所指出的，“也”代替“旃”的時候也不一定發生過口頭語言上的變化，只是在書面語上

³⁹ 參見據大西克也、大櫛敦弘（2015: 37–39）。

⁴⁰ 比如介詞“于”和“於”，頗有可能兩者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形式，歷史上大體發生過“於”替代“于”的演變。戰國時代楚地書面語已經幾乎只用“於”，但銅器銘文等較莊重的場面也可見古老的“于”（參見風儀誠2007: 85、宋華強2010: 284、宮島和也2015、2017）。

⁴¹ 李守奎（2014/2015: 209）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從相關出土材料來看戰國晚期各系文字都趨同用‘也’。”

的表記習慣的演變而已，在口頭語言上則各地語言有可能繼續使用自己的方言形式。

5. 結語

本文主要考察“也”和“旃”的地理分佈及其演變，以補充闡明上古漢語語氣詞“毆”“也”和“旃”的演變過程，而主張：①“旃”是具有三晉（中原）地區地域性特徵的詞（或表記），東方地區曾呈現出“也”和“旃”在地理分佈上的對立；②春秋時代“旃”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從晉國傳播到吳國，吳國資料中的“旃”體現出當時晉國和吳國之間的密切關係；③“毆”代替“也”之前，在東方地區發生過“也”代替“旃”的現象，這是互相交流的結果。

本文討論的“也”“毆”和“旃”體現出這種東周時代各地書面語及其演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一面。同時這是利用出土文獻才可以更精確地了解到的，也表示著出土文獻對漢語史研究上的重要性。

參考文獻

[中文]

曹錦炎

- 2015 新見攻慮王姑發皮難劍銘文及其相關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143–151頁。

陳光軍

- 2016 新見晉地鑄吳國兵器之小議，蘇州博物館編《蘇州文博論叢》2016年（總第7輯）：16–21頁。

陳昭容

- 1993 從秦系文字演變的觀點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本：569–621頁。

- 2016 漢字起源與先秦漢字文化圈形成的初步探索，黃銘崇主編《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111–164頁，臺北：中央研究院。

程義、張軍政

- 2015 蘇州博物館新入藏吳王餘昧劍初探，《文物》2015年第9期：75–82頁。

大西克也

- 2001 “毆”“也”之交替：六國統一前後語言的一個側面，《簡帛研究二〇〇一》614–627頁。

風儀誠

- 2007 戰國兩漢“於”、“于”二字的用法與古書的傳寫習慣，《簡帛》第2輯：81–95頁。

宮島和也

- 2017 從戰國楚簡、秦簡來看上古漢語的“于”與“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341–352頁，上海：中西書局。

郭永秉

- 2018 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嶺南學報》復刊第10輯：109–128頁。

- 2020 魏國青銅器記容銘文中的“戡”和“𡔷”，《中華文史論叢》2020年第4期：93–119頁。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83 河南溫縣東周盟誓遺址一號坎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77、78-89頁。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1979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期:1-31頁。

黃錦前

2017 郭莊楚墓出土競孫鬲、方壺銘試釋,《國學學刊》2017年第1期:135-139頁。

黃盛璋

1984 戰國燕國銅器銘刻新考,《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49-53頁。

李守奎

2014/2015 清華簡《繫年》“也”字用法與攻豕王光劍、繼書缶的釋讀,李守奎《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207-218頁,上海:中西書局。

馬曉穩

2017 《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1976 《侯馬盟書》,北京:文物出版社。

宋華強

2010 《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蘇建洲

2016 釋與“沙”有關的幾個古文字,《出土文獻》第9輯:127-144頁。

魏宜輝

2018 吳王餘昧劍銘文補議,《出土文獻》第12輯:82-87頁。

吳良寶

2009 平安君鼎國別研究評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第4期:81-86頁。

吳振武

2006 試說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中的“旃”字,《中國文字學報》第1輯:73-76頁。

張玉金

2011 《出土戰國文獻虛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朱德熙

1979/1995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 整理)《朱德熙古文字論集》91-108頁,北京:中華書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7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

[日文]

江村治樹

2000 《春秋戰國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大西克也

1998 「毆」「也」の交替:六國統一に於ける書面言語の一側面。《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第2号:4-24頁。

2006 戦国時代の文字と言葉—秦・楚の違いを中心に—,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篇《長江流域と巴蜀,楚の地域文化》146-174頁,東京:雄山閣。

大西克也,大櫛敦弘

2015 《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 戰國縱橫家書》,東京:東方書店。

佐藤信彌

2021 《戰爭の中國古代史》東京:講談社。

平勢隆郎

2020 《中國の歴史2 都市國家から中華へ》東京：講談社。

宮島和也

2015 戦国楚・秦における前置詞「于」「於」をめぐって。《中國語學》262号：114-133頁。

宮本徹、松江崇

2019 《漢文の讀み方：原典解讀の基礎》東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

[歐文]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Takashima, Ken-ichi

1997 Focus and Explanation in Copulative-type Sentences in a Genuine Classical Chinese Text.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6(2): 177-199.

語料來源與簡稱（除上文已附注的）：

《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集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

睡虎地秦簡：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

清華簡《筮法》：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中西書局，2013年。

《左傳》：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09年。

《論語》：《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 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禮記》：（清）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

《大戴禮記》：（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中華書局，2013年。